

#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演进

冯 燕

**【摘要】**农村面源污染及其治理模式的转变反映文化轨迹的变化历程。传统社会时期人类被动地适应生态环境而形成生存型文化,工业社会时期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控制自然环境形成生产型文化,随着生态文明的倡导,人类以生活型文化为主导,主动平衡物质消费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在实际文化运行轨迹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与需求容易导致文化脱轨现象,引发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矛盾的增多。文化凭借自身具有的“反身性”特性对不适当的行为予以主动修复与纠正,实现整体社会从生产型文化向生活型文化的转变,保持人与生态关系之间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农村; 面源污染; 环境治理; 文化变轨; 农家乐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6]06-0161-06  
10.13553/j.cnki.llygg.2016.06.032

在促进“三农”发展的同时,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也成为重要议题。农村面源污染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种植业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使用;二是畜禽养殖业产生过量的粪肥无法处理;三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水的排放。本文主要关注第三个方面,从日渐繁荣的农家乐旅游业入手,分析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演进路径。

## 一、农村面源污染及其治理述评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随着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生态环境开始朝着不利的方向迈进。2007年国家环保局等八部委局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农村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个别村庄饮用水还未实现达标,一些农村环境问题已

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sup>[1]</sup>然而,2007年至今,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势头。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

国外有关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早,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K. Anger通过对德国基尔湾南部地区长达半年的问卷调查,发现海湾内部生态系统遭到生活污水的影响并表现出季节性特征,是受到当地社区结构的改变,包括空间等级、稳定性、复杂性、常态性等因素的影响。<sup>[2]</sup>Frederic Bass对美国明尼苏达地区(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社区、人口等因素的分类,他发现各种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对不同类型的群体在疾病影响上有着显著的差异。<sup>[3]</sup>Steve Hamner等发现由于印度Ganges河周边地区的居民每天向河中倾倒入2亿升以上的生活污水,导致该河面源污染十分严重,并且导致了周边居民尤其是生活条件较差、教育水平不高的人群遭受着疾病的困扰。<sup>[4]</sup>Will Joseph Brownlie等通过对苏格兰地区156位私人生活污水系统使用者(PSS)的问卷调查发

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学子项目“城市化背景下环境行为的研究——基于杭州市若干社区的研究”(13ZHFD05) 项目负责人:蒋培。

作者简介:冯燕(1986-),女(汉),陕西铜川人,河海大学社会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现,有效的 PSS 利用者能够形成较低的磷(P)污染状况,这与个体的环境行为有直接关联。<sup>[5]</sup>

面源污染治理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机制现象。社会学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角度分析污染问题的成因,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方式等。陈阿江分析了江南地区农村水污染的社会成因,认为传统社会保持水域清洁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村落社会规范,而90年代以后水污染的加剧则主要源于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村落自治组织的消亡及社区伦理规范的丧失。<sup>[6]</sup>张玉林认为中国农村因面源污染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逐渐增多。这与政经一体化增长推进机制有着重要关系: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和税收的增长成为了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了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倾向,受害农民难以获得补偿的权利,相应的污染纠纷也随之升级。<sup>[7]</sup>王跃生认为制度因素通过对农户行为方式的影响进而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影响。<sup>[8]</sup>乐波也认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法律对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处罚的缺失等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sup>[9]</sup>洪大用、王晓毅认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sup>[10][11]</sup>与此同时,农村知识逐渐让位于外来的知识,农村权力结构发生转移,也是导致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sup>[12]</sup>秦红霞等提出,农村面源污染与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极大的关联。炫耀性消费和农村环境管理的滞后使农村的环境面临危险。<sup>[13]</sup>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原因分析,而有关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村面源污染的实地调查,分析农村面源污染产生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治理路径的演变过程。

## 二、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态效应

传统农耕社会是在较小的范围内保持物质与能量循环稳定的社会有机体。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物质都能通过自身的模式运作得以有效地容纳和消化,所以,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有废物无垃圾”的社会。<sup>[14]</sup>

陈阿江等曾设想了一个传统农村的村庄模型(详见图1),在整个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维持区域范围内的自我循环与生态的稳定,实现

了村庄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与相互沟通,保持社会有机体的和谐统一。人及畜禽所需,主要来自于村庄范围内的物产,而他们的排泄物又回到土地成为植物的养分,形成土地——庄稼——牲畜——人群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平衡。<sup>[15]</sup>从图1中可以看出,整个农村社会是一个很稳定与封闭的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农民的生产生活行为都是依照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来开展的,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社会生活文化体系,或者可以称作是地方性知识。文化的作用是能够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子孙且作为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范准则,继而持续地巩固与保持地方性知识的长期存在。可以发现,地域的封闭性、社会有机体循环过程的封闭性与文化系统的封闭性等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与作用,进一步实现不同系统的封闭与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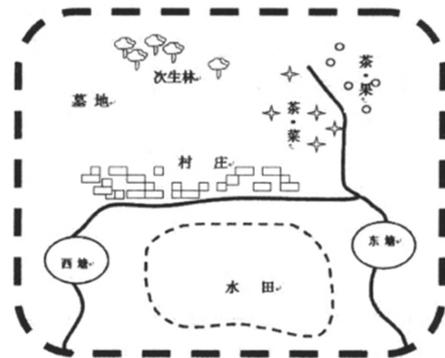


图1 传统农村生产生活示意图

在传统农村社会生活过程中,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民极度依赖于土地,是粘着在土地之上的。<sup>[16]</sup>因此,在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压力之下,每一个个体都力求通过土地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实现和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结合当时社会的文化、技术与经济等状况,农民时刻受到“生存性文化”的影响。在生存性文化作用之下,农民需要长久维持土地的地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保持各种物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以期实现最大化的物质收获来满足家庭的生计需要。

因此,传统农村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主要为厨余垃圾和厕所污水)很多都被作为牲畜的食料和田间地头的肥料所消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生产技术与生活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农村地区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如使用化肥、饲料等,导致原有农耕社会中的物质能量循环断裂,各种废弃物不断增多且难以完成自我消解,从而

造成当地社会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凸显。

### 三、市场经济时代农村面源污染的风险与治理实践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原有的农村生产生活模式难以抵御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冲击,其中以农家乐旅游业的发展表现最为突出。农家乐旅游业发展所导致的水污染风险,是农村面源污染的集中体现。通过农家乐旅游业集聚地区生活污水污染状况的调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农村面源污染现状。

本文选取浙北的白村作为调查点来进行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农家乐以来,白村的农家乐旅游业发展模式已非常成熟。当地不仅有大量的餐饮和住宿为主的消费服务,同时还衍生出以长期租赁服务为特色的度假区。在当地农家乐发展的过程中,餐饮和住宿服务的大量消费给当地居民的经济致富带来了机遇。但与此同时,随着产业发展的无序化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人口聚集所产生的各种废弃物也慢慢逼近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承载量,造成了以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为主的面源污染。

白村农家乐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两部分:厨房污水和卫生间污水。旅游高峰期,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当地消费,所产生的生活污水远远超过了当地农村原有的各类基础设施的消解容量。以2012年白村的旅游人数总量26万余人次为依据,假设每人在当地逗留一天,每天增加的人数高达700多人,给每个农家乐经营户增加约5个人的负担。但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游客往往在节假日长时间居住于当地,有的游客居住时间甚至长达二、三个月,所以,实际情况餐饮业所产生的污水量会更大。此外,以上数据中还没有包括各种在当地购买了度假房的外来“新村民”<sup>①</sup>这类居住群体所产生的餐饮垃圾与污水数量也是巨大的。根据对周边居民的访谈,可以了解到当地面源污染的情况。“以前我们这边的水很干净的,直接趴在溪边就可以喝,现在没人敢直接喝了。溪里的鱼也越来越少,青苔也不太看得见了……景区里有一个“兰亭水库”,水库里的水原来是碧绿碧绿的,很干净,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主要原

因是在该水库旁边建造了一些宾馆,铺了管道都是装样子,实质上是把污水直接排到水库中去。”(2013年5月陈先生的访谈录)

农家乐经营户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生活污水数量直线上升,但与之配套的各类污水处理设施却仍没有跟上。当地农民仍以传统化粪池或者三格式沉淀池来处理生活污水,甚至有的经营户直排生活污水,丝毫没有顾及周边环境。据了解,当地政府部门在农家乐发展初期意识到环境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农家乐所产生的生活污水。2013年当地县旅游部门发布《关于重点农家乐特色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建设的情况汇报》中指出,“2008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了重点农家乐旅游特色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建设的力度……共计有28个重点农家乐村(点)建成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并投入运行,基本实现全市重点农家乐旅游特色村的全覆盖;683户农家乐经营户实现截污纳管,占全市经营户比例的81%,预计总投资达2000余万元,建设资金由市级有关部门不少于50%配套补助和其余由乡镇、村自筹方式进行拼盘。”。当地农家乐截污纳管的工作从2008年开始落实,包括白村在内的一大批农家乐产业特色村庄也是按规定建设了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那么农家乐的生活污水实际的处理情况如何呢?

与当地农民的访谈中了解到,虽然政府出资建设了一些排污管道,但大多数仅在路边铺设了管道,终端的污水处理设备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农家乐经营户的污水管道也没有接入主管道中。所以,整个污水处理设施难以发挥实际效用。这些情况在笔者与当地县旅游部门和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的访谈中得到印证。按照当地县旅游部门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来看,现在很多农家乐特色村庄与聚集区基本都进行了截污纳管,很多地区甚至可以说是100%的实现了污水纳管,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难以发挥出效力。一是设施建设不完全,很多只是建设了部分工程;二是因为成本高,很多村庄的污水处理设施实际使用率低,甚至有些村庄存在平时从来不用,上面来检查才开动一下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理性的影响下,农民趋向于利用大量的现代技术与高效资源追求更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价值。例如,传统农家肥逐渐被化肥取代;农药的

<sup>①</sup>2014年春节前夕,笔者到白村进行调查,在村委办公楼前面看到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白村新村民回家过年!”。这主要就是指在白村购买了当地的“小产权房”的外来消费者,所以,在此,笔者也以“新村民”一词来代替这部分群体。

使用量不断增加; 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消耗转向外部市场输入, 牲畜饲养几近消失, 转而从事更有经济价值的商业行为。正如施耐博格所提出的“跑步机”理论, 大量的生产是为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大量的消费则是一种社会文化所造成的, 大量消费意味着个人一种成功社会地位的体现。这种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行为模式, 往往会导致一种不正常的消费文化, 即实际所需的消耗远没有这么多, 与此同时, 这些行为也容易导致极为严重的生态负面效应。<sup>[17]</sup> 这种行为模式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民众的价值观和文化思维的变化。民众并不仅仅满足于一种生存文化的需求, 而是开始崇尚一种新的“生产性文化”的追求。“生产性文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于自身的物质追求而是为了实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攀比、炫耀与夸奖等心态的一种满足。在这种生产性文化引导下所生产出来的各种物质资源已经超过正常社会物质需求上限,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废弃物也加重了外部生态环境的负担。

#### 四、新时期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社会实践

随着农家乐生活污水所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加重, 很多地区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以此实现传统农村生产生活循环模式的重建, 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和谐统一。

在此, 选取与白村同县的童村为例来说明新时期农家乐水污染治理的新模式。童村位于该县的西南部, 主要是以农业、林业、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童村可谓是大山中的“世外桃源”, 生态环境优美, 村庄内古建筑保存完好, 村落的文化气息浓厚, 形成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全村开办农家乐的经营户十余家。发展初期, 童村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生活垃圾乱堆乱放, 生活污水乱排放。随后, 村委借着新农村建设的契机, 设立垃圾回收箱和铺设污水管道, 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童村位于山谷地带, 与周边的村镇距离较远, 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交通运输成本过高, 村委难以承担; 二是生活污水进行统一纳管处理后, 农民没有了足够的农家肥为蔬菜和培育苗木提供肥料, 而且生活污水的生化处理成本也很高, 此外还要附加一定的设备日常维护费用。基于此, 村民思考如何从本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处理手段。经过不断尝试与比较, 童村最后确立通过建设高标准的人工沼气池。沼气池的循环利用模式, 不仅能

够为农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燃料, 减少对树木的砍伐, 也有效地处理了可腐烂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同时保障农民日常生产所需要的农家肥。村委在村周边建立了垃圾焚烧炉, 通过对生活垃圾进行简单的分类, 对可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利用, 对不能回收部分进行焚烧处理, 既减少了垃圾的数量也降低垃圾运输与填埋所需要的成本。通过沼气池循环利用项目的建立, 不仅减少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为清洁的燃料, 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可见, 通过传统农耕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模式可重新构建起现代社会的循环路径, 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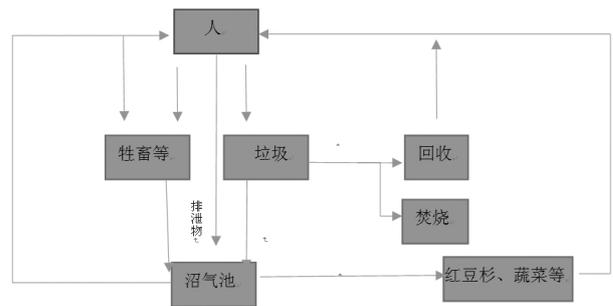


图 2 童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物质能量循环图

从童村的案例中发现, 在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农耕社会文化得以良好结合的前提下, 地方社会不仅能发展当地经济,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保持一种稳定、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村庄都有其自身地域与文化上的特殊性, 不能简单照搬方法来嫁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 而是需要充分发挥当地居民自身的积极性来寻找一种适合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发展之路。正如美国社会学家 E·希尔斯所言, 这类文化具有一种中国社会中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 特征, 这种特征能够伏脉千里, 千年不倒, 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存在, 它们同敬重权威、思念过去、信仰上天等人类特殊的情感一样, 适应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原始心理需要。<sup>[18]</sup> 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各种外来文化的侵入会转变原有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生产、生活方式, 就有可能与周边的自然环境不一致, 这就需要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 始终秉持自身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地域性文化, 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有机融合, 共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

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 认为应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待与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生活

环境主义通过尊重、挖掘、激活当地生活中的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或者说,既能从生活的角度“安抚”自然,又能使其成果得到反馈,用来改善并丰富当地人生活。<sup>[19]</sup>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对改变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生产性文化有重要启发意义。以生活环境主义为引导的农村生产生活模式,在注重物质资源需求与经济利益获取的同时,逐渐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努力保持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稳定与平衡,呈现出一种“生活性文化”的取向。生活性文化下的农村生产生活能够很好地维持物质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活性文化与生存性文化表现出极为相似的文化意涵与行为模式,但从本质上来看分析,两者所处的层次与地位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首先,在物质生产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物质生产在生活性文化指导下几乎不存在任何阻碍,但这却是生存性文化下的最难以破解的困境。其次,从行为模式上来分析,生存性文化中的个体行为往往是迫于现实的压力而做出一种趋于中和的行为,具有很大的被动性。然而,在生活性文化下,个体积极的调节物质生产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主动权掌握在生产生活主体的手中。

## 五、结论:文化变轨——“人与生态”关系的演替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实践显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表面上来分析是技术手段与实际应用模式的不同,但从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本质分析,则是维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不同。从生存性文化的存在,到生产性文化的蔓延,再到生活性文化的诞生,无一不是整个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结果,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保持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一致。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以生存为主的农业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过渡到了工业社会,由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新的影响,从而出现强调人类自身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共存的生态文明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变轨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的理想类型:(1)以生存型文化为主的农业社会;(2)以生产型文化为主的工业社会;(3)以生活型文化为主的生态社会。

第一阶段,由于人类自身的工具手段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对于自然资源和外在环境的掌握能力有限,难以实现大范围与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只能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极大地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且保持相互之间的平衡。人类都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大,绝大多数的个体之间的生存状态具有相似性与一致性。

第二阶段,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大部分群体都积极加入到生产活动中,生产所带来的大量产品远远超越了人们日常生存所需的规模。个体的占有欲望不断膨胀,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层出不穷,大量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自然资源的耗竭程度加大,各种废弃物数量不断增加。以炫耀性、攀比性心理为代表的生产型文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体的生态环境恶化,逐渐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与精神需求。

第三阶段,由于外在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人们开始明白各种观念文化与生产机制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来限制人类各种过度消费行为,保持自然环境的稳定与和谐,把人类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统一起来。在这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之前的紧张、对立走向统一与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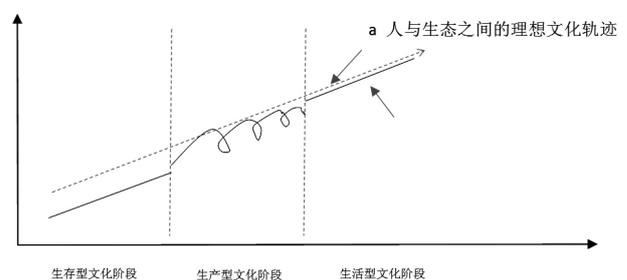


图3 文化变轨的三个阶段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文化变轨的过程。如图3所示,a代表的虚线看作是人与生态关系的理想文化轨迹,人与生态和谐相处。这种理想的文化轨迹实际上是由自然环境状况所构建而成,始终是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协调统一的重要准则。b所代表的实线则是人与生态关系背后文化轨迹的实际路线。在大部分时间内,实际路线与

理想路线之间是存在着相似或者统一的运行轨迹,这也是维持生态环境和谐统一与整体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准则。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直保持两者轨迹的统一。

在生存型文化之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动式的稳定;在生产型文化阶段,由于社会发展人类自身文化的变化,导致实际轨迹与理想轨迹之间出现了脱节,相互之间不能够很好的契合,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等。在生活型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开始趋于稳定、统一,但这种关系与生存型文化之下的关系有着很大区别,人类主动意识到外在生态环境对自身的重要性,实现了一种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能力。从整个文化变轨历程来看,实际文化轨迹的运行路线始终是围绕理想文化轨迹来进行,虽然不同时间段的运行轨迹偏差会有很大不同,但两者之间始终是相互影响且以理想文化轨迹为中心。

这可以通过人类社会的“反身性”(reflexivity)文化来予以说明,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状况予以不断地反思与自我监控,才能逐渐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正如卢曼所理解的,“反身性”主要指社会系统的“自体再生”(autopoietic)。“反思”或“自我反思”是社会系统得以构成和维系的重要手段,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对自身认同的谋求,通过反思,社会系统建立起关于自身协调的历史,从而保持着自身的活力和革新能力。<sup>[20]</sup>通过人类自身的“反身性”文化来逐渐转变社会发展中各种不利的局面,实现人与生态、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jzwgk/2007-11/20/content\\_810780.htm](http://www.gov.cn/jzwgk/2007-11/20/content_810780.htm). 2015年5月4日访问。

[2] K. Anger, On the influence of sewage pollution on inshore benthic communities in the South of Kiel Bay, Helgolander wiss. Meeresunters, 1975(27): 408-438.

[3] Frederic Bass, SEWAGE DISPOSAL AND STREAM POLLUTION IN MINNESOT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14(4):

870-873.

[4] Steve Hamner, The role of water use patterns and sewage pollution in incidence of water-borne/enteric diseases along the Ganges River in Varanasi,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April 2006, 16(2): 113-132.

[5] Will Joseph Brownlie, Assess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from Private Sewage Systems, Human Ecology 2015(43): 131-140.

[6] 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 东村个案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0(1): 62-69;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 学海, 2007(1): 36-41.

[7] 张玉林.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 探索与争鸣, 2006(5): 26-28.

[8] 王跃生. 中国农业的环境生态问题[J]. 经济学家, 1998(2): 99-104.

[9] 乐波.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环境问题[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10): 227-231.

[10] 洪大用, 马馨芳.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4(4): 1-7.

[11] 王晓毅. 农村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58-65.

[12] 王晓毅. 论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J]. 学海, 2010(2): 60-62.

[13] 秦红霞等. 村民生活方式与农村环境问题[J]. 上海经济研究, 2006(7): 90-96.

[14] 富兰克林·H·金. 四千年农夫[M]. 程存旺、石嫣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113.

[15] 陈阿江等. 游牧的小农化及其环境后果[J]. 学海, 2013(1): 55-63.

[1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

[17] Michael Bell, An Invitation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Pine Forge Press, 2004: 64.

[18] E·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吕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5.

[19] 鸟越皓之. 环境社会学: 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56.

[20] Luhmann 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责任编辑: 罗晓红